

# 20世纪与苏俄哲学

贾泽林

提要 “苏联哲学”是20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它经历了从产生、存在、演变到终结的全过程；“后苏联哲学”即今天“俄罗斯哲学”的现状表明并无形成全俄统一哲学的迹象。

主题词 苏联哲学 苏联哲学的形成、演化与终结 俄罗斯哲学的现状与未来

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通常被看成是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认为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走向和进程，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历史走向和进程。20世纪甚至被称之为由俄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世纪”。人们没有预料到苏联会在1991年12月解体，更想不到“苏联哲学”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自己的存在。从而成为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的独一无二的“世纪性”现象：产生于本世纪之初，终结于本世纪之末，在20世纪里持续了74

年，几近一个世纪，但却终于没能“跨越”20世纪。不过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说：苏联解体和苏联哲学终结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最具启示意义的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20世纪留给世人的可供人们长久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20世纪在俄国发生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繁荣和危机)都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意义，而深入探讨苏联哲学是怎样存在和为什么终结这样的问题，则将启示我们对哲学命运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必须讲明一点，这里所说的“苏联哲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横跨欧亚两洲因而兼受欧亚两种文明的影响)，在一国范围内产生的一种打下鲜明俄国烙印(俄国精神和文明传统、俄国的民族特性等)的“马列主义哲学”即“苏联形态的马列主义哲学”。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不能也不应把它完全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不能也不应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所谓“苏联哲学”，更准确些说，实际上指的是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统治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在“苏联时期”，除了“主流哲学”之外，还有一种一直处于“无关紧要”、“受压制受歧视”地位的“非主流哲学”。这部分哲学是“哲学一般”，它研究的对象是古往今来各种哲学都研究的对象，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科学哲学等。由于它与政治离得较远或与政治毫不相干，故而它所受到的干扰较少，它因此而取得过相当可观的成绩。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苏联哲学”在20世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哲学形态中，都堪称独树一帜，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苏联哲学”尽管已经终结了，但它必定是俄国历史上抹不掉的部分，是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哲学”是怎样产生和确立的？

要想弄清“苏联哲学”是怎样“终结”的，必须从索解它产生、确立、定型的过程入手。“苏联哲学”与世界上其他各种形态的哲学有很大不同，甚至完全不同。(1)“苏联哲学”是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产物：它是1917年以后才出现在世界上的，而且是逐步形成的。尽管它声称自己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但在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也就是说，它的出现并不是把一种“现成”的哲学即此前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照搬”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结果。“苏联哲学”的产生和形成有它自己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俄国(后来的苏联)是第一个明确以某种理论为“立国”依据的国家。这个国家即苏维埃政权则为这种代表自己利益的理论(即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苏联哲学”)的确立提供了全面而强有力的物质上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和保证。换句话说，“苏联哲学”是靠政权确立起来的。(3)“苏联哲学”在其产生时即已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这些“弱点”或“缺陷”，在得不到“后天”的补救和改正(尤其是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为这一哲学后来朝否定方向演变埋下了“祸根”。

具体说来，“苏联哲学”是在下述条件下和环境确立和生存的：(1)“苏联哲学”诞生在社会和人文发展水平较低的俄国，而俄国的落后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苏俄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苏联哲学”的形成和演变。列宁晚期(1923年后)对俄国的“国情”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说过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sup>[1]</sup>；“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sup>[2]</sup>现在应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的前提”<sup>[3]</sup>，只有在“实现了文化革命”之后，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sup>[4]</sup>。那时他还说过：“我们

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sup>[5]</sup>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该文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哲学遗嘱”)中曾号召说:应通过“无神论的宣传”,而不是“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来使“千百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sup>[6]</sup>。列宁显然认识到: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大众的“愚昧状态”对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接受、理解和掌握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的。革命可以在几天之内取得胜利,政权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但解决“千万人民群众”“摆脱愚昧状态”的任务,却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遗憾的是,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没能理解列宁这一论点的极端重要性,没能认识到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此,不能不说苏联是在“文明前提”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因此那里从不曾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2)后来的事实表明:俄国人和后来的苏联人为严峻的历史局势(外国“封锁”和国内战争,经济衰退和物质生活匮乏,旷日持久的党内“路线斗争”等等)所迫,受文化素养不高和不健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势的困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往往采取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态度,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选取那些能解燃眉之急的论点,从而始终未能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髓和实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理论方面的种种缺点(片面、教条、死板、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等)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泛滥而日益加深。30年代初由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苏联哲学”塑造了“体系哲学”的“雏形”(米丁等依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依据当时政治的需要,赋予它以体系的形式。这个“体系”带有明显的“米丁色彩”和30年代苏联政治斗争的痕迹),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体系”定了“形”,由此而在世界上首创了“教科书形态”的“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作品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那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苏联式”的“思维方式”和“苏联式”的理论工作风格。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肤浅、简单化、教条比、绝对比、极端化、政治化。斯大林(以及米丁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粗俗理解(包括曲解)和简单比的表述,在当时曾以“党中央决议”这种指令形式把它“规定”为“经典”和“范本”,确立为绝对不许有半点违背或逾越的“准绳”(甚至成为划分敌我、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如“在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苏联在1938年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比,等等)在1953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从一个方面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模糊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3)对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轻视和忽视,使得苏联的理论工作在多数时期都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致(通过行政手段和高压取得),用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和各种应时理论作品的数量来证明在普及和宣传(即所谓“灌输”)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绩(仅《联共(布)党史》就再版过301次,发行过3500多万册)。对马列主义并未真正在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和没有为人们所把握的实情熟视无睹。近年来俄国出版物上披露的大量事实(包括理论界人士的自我“表白”)表明:许许多多苏联人的世界观在那时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统一的“苏联哲学”的“名义”下则“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唯心主义的)。(4)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全力支持为“苏联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并取得“国家哲学”(“官方哲学”)和“唯我独尊”的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这同时也给它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化”(失掉哲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它养成了对政权的过分依赖,对行政命令有效性的过分迷信,忘记了它主要靠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彻底性和魅力来征服人心的过程,从不思考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它还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这样生命攸关的问题。(5)苏联建国初期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条件,使得从前在广阔而开放的自然历史空间中生存、斗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转入苏联一国的有限而封闭的空间,它丧失了与外界的天然联系,割断了与世界和世界思想界的交往、联系、对话和交锋;它在人为的封闭的环境中,在无真正对手、从而总是不战自胜的情况下,沾沾自喜于自己不受任何“侵犯”和“挑战”的特殊地位,逐渐地丧失了从前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竞争和斗争求生存的本能。

“苏联哲学”在“形成”和“定形”过程中受到过“致命内伤”

“苏联哲学”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模式”和“样板”建立起来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作风和他的许多理论错误,给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通常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危害最大的是“修正主义”,但就“苏联哲学”这个特定的具体对象来说,历史事实已确凿无误地证明:给它造成最大危害的则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在“苏联哲学”从幼年走向成年、从“雏形”走向“定形”的关键时期也即它最容易受到侵害的时期对它产生负面影响的。据此可以说,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在当时导致“苏联哲学”朝“极左”方向演变并为它后来朝“极右”方向演变埋下了“祸根”。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苏俄受到强大的俄罗斯固有的“精神传统”的制约,受到苏联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和



条件的限制。它因长期生活在苏联这种极为人为的条件下，屈从于苏联环境的“挤压”而被苏俄的现实所“驯化”。在苏联，先是教条主义后是修正主义，然后是两者的“加合”，从根基上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最终则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联哲学”的终结。

苏联哲学”是怎样“终结”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哲学”开始出现种种变化，其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苏联哲学”经历过50年代中期“解冻”带给它的兴奋和转机，经历过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停滞”带给它的新伤害。苏联政局的变化，造就了被称之为“苏共二十大产儿”和“60年代人”的一辈人。正是他们成了后来苏联理论界和哲学界的中坚力量，成为1985年开始的“改革”的人才基础。1985年开始的改革曾给“苏联哲学”带来机遇和希望，然而“改革”失败却最终

造成了它的结束。苏联哲学之所以弄到曲终人散的结局，从根本上说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

苏联哲学有许多独具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其他哲学所没有的。正是这些唯它独具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命运——它的存在和终结。

(1)“苏联哲学”是与政权和国家共存亡的哲学：哲学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一种形态的哲学，其产生、存在、存在的时间长短和何时终结自己的存在，一般说来，与它所在的国家的那个国家里的某种特定性质的政权存在的时间长短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即便生命周期被看成是10年左右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也与该国政权存住的时间长短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苏联却为历史提供了这样的首例：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苏联作为一种政权形式的消失，带来了“苏联哲学”的消亡和终结。众所周知，苏联哲学是由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确立起来的，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它是靠这个政权的支持才取得“国家哲学”(或“官方哲学”)的地位的，才成为独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苏联哲学的命运是与作为国家和政权形式的苏联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2)“苏联哲学”是有始有终的哲学：哲学有开端，在可预见的将来哲学似乎不会有终点。但哲学的开端，从时间上说，并无确切的日期。由于其终点未可预期，故而它的“终点”也很难说会有确切的时限。世界上各种哲学流派，大多都有其产生和消亡的时间标志，但时间标志往往并不那么清晰明确。苏联哲学的特点是：它产生和终结的时间标志都很明确清楚。苏联哲学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产生的，是在1991年12月结束的。事实表明，苏联哲学跟世界上的所有现

象和事物一样是受时间空间制约和限制的，而不是什么超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永恒的东西。

(3)苏联哲学是政治化很彻底的哲学，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哲学与政治有关系，有的关系还很密切。然而哲学毕竟不是政治，也不应变成政治。哲学既不应成为现实政治的“陪衬”，也不应成为社会精神生活可有可无的“点缀”，但“苏联哲学”却是极为政治化的哲学。有意思的是，苏联哲学彻底政治化的时间起点也很确切。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进行的“谈话”是苏联哲学彻底政治化的标志。斯大林在这个“谈话”中，把德波林学派定性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和“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认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

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sup>[7]</sup>从此开始，在苏联再无与政治无关的学术研究可言。在“最抽象理论问题”上发生的任何微小的“偏离”或“背离”都可以上纲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轻则被批判、撤职，重则被镇压(从3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的清洗和镇压，就是以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为依据和指针的)。从那时起，苏联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一个人代替所有人的思想”，“发展”理论的权力只属于“一个人”，用“中央决议”等“指令”方式“规定”什么是可以研究的和什么是禁止研究的。正常的学术争论和讨论被“废除”。马克思主义从此被变成仅供“背诵”的“条文”或过程而“束之高阁”。

(4)苏联哲学是一种不断违背自己本性的哲学：第一，通常认为“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本性。它对世界上所有事物和现象的理解和基本态度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sup>[8]</sup>(马克思)。自诩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哲学”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和在革命进行之中

与在革命成功之后，其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在确立起苏维埃政权之后和在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哲学”对现实表现出彻底的非批判态度。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权者的政治需要进行“应时”、“顺势”的辩护，这样它便从根本上抛弃了自己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第二：苏联哲学认为它与以往全部哲学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仅解释世界，主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苏联哲学家在1985年“改革”兴起的初期，在“反思”以往时，曾感叹地说：“想不出有哪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它(哲学)解决的”。的确，它不仅没能和没有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甚至也没能和没有解决哲学自身的重大问题，没能和没有从学术上把哲学推向前进。那时的当政者并不要求(在很多的情况下是根本不许)他们提出、揭露和研究苏联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积累已久的矛盾和问题。如果那时的“哲学”和“理论”真的把苏联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地、一个一个地解决了，苏联社会怎么会陷入后来那种积

重难返的困境。正是“问题”和“矛盾”的长期积累直到最后的“总爆发”毁了苏联；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自然历史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哲学。离开了它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历史环境，脱离人类文明主流，它的生命力业、将被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被苏联的现实“驯化”之后，它长时间处在封闭、孤立、一国、人为、与本国和世界的文明传统断绝联系的环境和条件下。它无需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它从来是不战而胜，它的“战无不胜”，它的战斗力因而是虚假的。在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种复杂和被动的局势时，它的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立刻暴露无遗；第四，苏联哲学在它存在的70多年里，始终热衷于塑造“体系”。仿佛哲学体系塑造得越是完美无缺；天衣无缝，它就越是威力无穷，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便都将迎刃而解。尽管恩格斯早就指出：当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时，由于体系必须完整，故而“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自己的体系”即设置一个“终点”。体系一旦极为完整，那就表明“绝对真理”已被掌握。历史将因“绝对真理”已被发现和掌握而“终结”。恩格斯因此说“德国古典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终结”。但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其他什么人的哲学(更不要说“苏联哲学”了)都没有穷尽、结束“真理”和历史，他们谁也不能完成“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sup>[9]</sup>。

(5)所谓“苏联哲学”和“苏联哲学界”是“统一”的假像与事实：前苏联时期，上至苏共领导人下至理论界人士，异口同声地向世界声称，在他们那里，只有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统一”学说即马克思主义学派。

事实表明，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并不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统一”和“一致”。“高度统一”和“高度一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时过境迁，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家在回首往事时指出：在前苏联时期，在苏联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只不过当时都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饰”着而已。那时在苏联既有从现象学、存在哲学，也有从实证主义哲学、语言哲学，甚至从宗教哲学立场上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营垒内部，也有各种不同倾向、主张和“潜形”的流派。

#### 今日的俄国和今日的俄罗斯哲学

“苏联时期”固然引入深思，然而“后苏联时期”尤为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在俄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在本世纪之初发生了从旧俄国向新俄国—苏联的转变，在本世纪末，则发生了从苏联向俄国的反转。现住的俄国与旧俄国(1917年以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它是从原有的苏联蜕变而来的。面这样的俄国，世人自然会生出一种预期，想知道在苏联解体和苏联哲学终结之后发生的一切：(1)俄国将向何处去，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样性质的国家和社会?(2)在俄国将出现什么样的哲学?(3)设想共产党重新上台执政，那里将出现什么样性质的社会体制?那里的哲学将是什么样的?曾经有过的“苏联哲学”是否会恢复原貌?

“混乱时代”与俄罗斯的命运：已被艰难生活折腾得精疲力竭的俄罗斯人，在过去的8年里，一直在苦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俄罗斯现在在哪里，俄罗斯往何处去，亦即思考有关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问题。

俄罗斯的忧国忧民之士通过对俄罗斯千年历史的思索，得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认识：目前的俄罗斯正在经历俄国历史上第三个“混乱时代”。在俄国的千年历史上发生过多多次涉及整个社会的危机、震荡和变革，然而没有哪一次的危机、震荡和变革在深度上能同90年代以来的危机、震荡和变革相比，90年代以来俄国发生的一切，远比俄国此前发生的一切，都从更深层上触及到曾把俄罗斯民族整合在一起(使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那种东西(无论是在前苏联时期形成的还是在以往所有世代形成的)的那些最根本的基础。

不错，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使俄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把一个落后的封建帝国转变为新兴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极为深刻并相当全面地触及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根本。在70多年间，俄罗斯人从不怀疑关于俄国命运的重大问题即“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早已在1917年十月一劳永逸地、不可逆转地解决了。然而，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却使俄国人突然感到自己重又被抛回到历史的“起点”上去，“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从头加以解决。

历史表明，只是到了20世纪末，俄罗斯的所有最根本的问题才被彻底触及和暴露出来。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民族，大约只有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折腾到谷底，折腾到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一无遗漏地暴露出来之后，才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无定形的哲学：与世人预期相反，直到1999年，在俄罗斯并没有形成什么轮廓清晰、形态固定、体系严谨的哲学。在苏联“改革”兴起的初期，俄罗斯哲学家曾热衷于谈论哲学是“复兴”还是“重建”这样的问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谈论这样的问题已经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了。俄罗斯的现今状况提出一个问题：能否说在一个国家里必须有一种统一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如果没有，也必须形成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尽人皆知，这种“观念”恰恰渊源于苏联。在

一国产生一种统一哲学的条件是：(1)社会有这种要求；(2)当政者有这种需要；(3)哲学界赞同。90年代俄罗斯的现实表明。在现今的俄罗斯，这三条，一条也不具备。

俄罗斯哲学界现在总的情况是这样的：迄今为止，它仍然处在“改变”自己以“适应”1991年12月苏联解体



以来俄罗斯出现的社会剧变新形势的阶段。哲学界对于在俄罗斯将出现什么样的哲学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强行形成某种“哲学”的教训，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头。

哲学的重新定位和定义：从总体上看，哲学在现今的俄罗斯被认为是基本上已经回复到它在社会生活中原应占有的“状态”和“位置”。哲学已不再起它在“苏联时期”起的那种“唯我独尊”和“指手画脚”的作用。哲学已成为诸多人文学科中的一种，它不再是凌驾于其他各门科学之上的“指导性”的科学。现政权并不特别要求哲学为自己服务(为自己出谋划策，为自己“辩护”)，因此再没有了向哲学界强行“下达”某种“指令”和“要求”的情况。哲学已成为哲学家们自己的“事情”(“事业”或“工作”)。哲学界研究什么课题，发表什么作品，出版什么杂志，杂志发表什么文章，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坚持什么观点，参加何党何派，全由自己做主。俄罗斯高等教育部于1994年制定并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哲学教学“基本标准”(基本要求)。各高校在制定“哲学教学大纲”时，只要符合该“标准”的要求，就可按自己制定的“大纲”来讲授哲学，至于在教学时采用什么教材，用什么观点来讲授，决定权则属于该校和讲课人。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前系主任A. 帕宁对哲学、哲学教育和哲学使命的观点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sup>[10]</sup>他指出，

哲学通常被定义为“爱真理”，这个定义并不完全准确。“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教会人们按着‘真’<sup>[11]</sup>生活”。近年来在改变哲学教育体制方面，该系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实现了哲学教育的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哲学返回到学院活动的界域”；“第二是从单一理论的、‘主义’式教学模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转变到哲学教育的多元模式，即注重汲取世界哲学发展的全部经验，其中首先包括20世纪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对该系教师的要求是：不能把课堂变成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地方。对该系学生的要求是：“学生选择何种世界观，纯属个人的私事”。“学生可以是神秘主义者、康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们的私事”。

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在今天的俄罗斯已被重新理解、定义和定位。俄国现今的哲学，已完全和彻底不再用“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呼，不仅从前的哲学定义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被弃置不用，就连“哲学”的框架、结构、内容也与前苏联时期的“哲学”大相径庭。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之类的“原理”已不再被视为必须讲解的题目。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它只被承认有“作为哲学思想流派之一而存在的权利，但它不再是作为凌驾一切学说之上的学说而存在。那种

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而且很难复生<sup>[12]</sup>。综观近年来出版的《哲学》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俄罗斯现在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知识和一般的哲学理论来教授给学生的，换句话说即哲学只不过是学校中的一门课程而已。至于哲学研究机构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其性质也与前苏联时期的哲学研究完全不同——这种研究的目的已不是为什么特定的“要求”和“需要”服务了。“哲学本来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和一国并不需要一种“唯一”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的看法，已成为多数俄罗斯哲学家现今的共识。

从今天形成的局势看，即使有一天共产党重新上台执政，在俄罗斯今后可能也不会再有像“苏联哲学”那种“统一”的和“唯一”的哲学。而“苏联哲学”恢复原貌，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正是上述这些已经发生了的根本性的变化，使我们有根据说“苏联哲学”终结了，“苏联哲学”确已成为世界哲学史上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看来，在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开始的世纪转换时刻，我们将看不到“后苏联哲学”或“新俄罗斯哲学”的“形成”。事情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即今后在俄罗斯根本不会也不需要形成那种能够得到全俄罗斯普遍认可的一种统一的“俄罗斯哲学”。

这是俄罗斯留给世人的一个强烈的历史悬念。

---

<sup>[1]</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

<sup>[2]</sup> 同上书，第687页。

<sup>[3]</sup> 同上书，第692页。

<sup>[4]</sup> 同上书，第687—688页。

<sup>[5]</sup> 同上书，第687页。

<sup>[6]</sup> 同上书，第605页。

<sup>[7]</sup> 参见《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49—51页

<sup>[8]</sup>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sup>[9]</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215、216页。

<sup>[10]</sup> 参见《新俄罗斯》1997年第3期，第24—26页。

<sup>[11]</sup> 指“真、善、美”意义上的“真”。

<sup>[12]</sup> 参见B.斯焦平：《处在世纪之交的哲学》，载于《哲学译丛》1997年第4期第26页。